



高校要在党内法规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 靳 诺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内法规是依规治党的制度支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依循。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了一系列党内制度法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把依规治党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把实践探索

和理论总结转化为制度成果，出台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党内法规，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果，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总结要求时强调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目前，我们党已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以党章为核心的组织法规制度、领导法规制度、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和监督保障法规制度的党建工作制度体系。近年来，党内法规研究也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全国成立了40多家研究中心。同时，与党的建设需要相比，还有一系列重大课题亟待研究，特别是需要发挥高校的学科优势，进一步加强制度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把党内法规制度的研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把握研究的思想维度。党内法规制度背后蕴涵着一种价值追求，体现着一种治党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思想指导，是党内法规制度的精神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形成重大成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和亲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新形势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根本遵循、注入强大动力。只有把党内法规制度的研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才能透过一条条法规、一项项制度的背后深刻理解和把握党内法规制度的时代背景、目标指向、精神实质、重大意义。

把党内法规制度的研究与党史、新中国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把握研究的历史维度。党内法规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问题的历史实践中产生的。一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奋斗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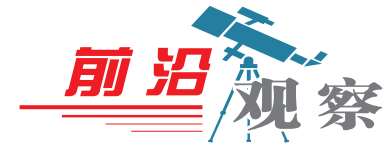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研究党内法规制度，必须树立历史意识，强化历史思维，把党内法规放到党史、新中国史的大背景中来研究和把握。我们党内各项法规制度的形成与确立，都是我们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步探索和确立的，任何一项党内法规制度都是与一个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离开历史，就难以理解和把握党内法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法规建设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80年代的恢复适应阶段；二是1990年代的快速发展阶段；三是新世纪之初的修订完善阶段；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建设的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立、改、废、留相结合的方针，推出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等关于党内法规制定的顶层设计，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重要党内法规，并确定了在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战略目标。

把党内法规制度的研究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研究结合起来，把握研究的法治维度。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都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重要依据，都体现着法治思维。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定机关、制定程序、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实施方式有着明显不同。从制定机关和制定程序来看，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中央各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党内法规制定程序制定的，而国家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依据立法程序制定的。从调整的对象来看，党内法规主要调整的是党内关系，而国家法律主要调整的是社会关系。从适用范围来看，党内法规

仅适用党组织和党员，而国家法律则适用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和党员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组织和公民。从实施方式来看，党内法规主要是以党的纪律作为强制手段，而国家法律则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在我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先锋队组织，由先进分子所组成，对党员的要求高于一般公民。这决定了党内法规严于法律。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因此，研究党内法规，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整体视野中予以观察和思考，既注意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不同特点，又要注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与宪法和国家法律相关内容、规定的衔接，更要注意两者价值目标和法治精神的一致性。

把党内法规制度的研究与高校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把握研究的学科维度。党内法规制度的研究要提高水平，出高质量的成果，必须有学科依托和支撑。近年来，党内法规制度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一些有条件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今年年初，国务院学位办又要求在党的建设学科下设置党内法规研究方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这既给高校党的建设专业和党内法规方向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也赋予了高校一项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任务。高校作为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应当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大力加强党内法规研究，为不断推动和完善我们党的制度建设和党内法规建设提供更好的学术支撑、理论阐释和人才支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以“中国之志”资治“中国之治”

□ 冀祥德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之治”这一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做好新时代地方志工作，就是以“中国之志”资政辅治、记录传承“中国之治”，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了解历史的可靠方法就是看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熟读县志、史料，经常拉着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走街串巷，去寻访县志里记载的古寺、古塔、古碑、古城墙等。为编写《正定古今》，他还主动为编写人员提供《真定府志》《正定县志》等旧志。刚到厦门工作时，他就借阅地方志。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不到一个月就借阅上海地方志。开展调研工作，他也经

常调阅地方志。他在福建工作时到古田、寿宁、霞浦等县调研，在浙江工作时到苍南县调研，均有借阅地方志的明确记载。

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具有存史、育人、资政三大功能。其中，存史是其基本功能，育人、资政是其现实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在育人方面，编修地方志可以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教材，爱国主义教育、英雄主义教育、美德教育，都要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同时，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也要树立地方自信心和地方自豪感，谈志就可以受到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教育。在资政方面，地方志是为现实工作服务的有力辅助手段，有助于以古为鉴，作出科学的决策。只有加深对历

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防止犯历史上的错误。

一定要把修志这项工作摆在议事日程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不懈努力，地方志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逐步形成了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书、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的工作机制。编修地方志是一项系统工程。第一，要有紧迫感。第二，要着眼长远。第三，要摆上日程。第四，要保障经费。

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修志这个历史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全国地方志工作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定位更加清晰、要求更加明确，顶层设计更加完善，工作任

务更加明确，全国地方志工作走上法治轨道，地方志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和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推进实现“两全目标”（即，到2020年完成第二轮地方志书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全部出版的目标；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的工作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完成进度不断刷新。下一步，要认清形势，坚定打赢必胜信心，自觉增强高质量完成“两全目标”的责任感、使命感，落实法定责任，切实加强领导，把攻坚决胜“两全目标”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紧迫的工作和政治任务来抓，如期完成“两全目标”，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方志人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们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吃完饭之后，习老很开心地跟我合了影。之后，习老对我说：“你是市委组织部长，平时要好好教育习近平，督促他好好工作。”

我笑着点头答应，心里想：“我虽然是市委组织部长，但也不好教育市委书记吧！”

回到福州之后，我把习老的话转述给近平同志。近平同志一听，笑了起来，他说：“我爸爸这话说得对，如果有什么该说我的，那也不该客气啊！”

近平同志调到浙江以后，我只要到浙江，就会去找他，他都乐意见我，叙叙旧，谈谈心。他到上海工作以后，我们也有联系，时不时谈谈工作和生活。

他到中央以后，我主动和他联系就比较少，特别是他当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后，我觉得就更不能打扰他了。现在，他日理万机，他的时间就是给全国人民服务的时间，耽误一点可了不得！

创新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新格局

□ 王玉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山东省临沂市在兰山区试点推进“平台指令、众人响应”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临沂经验”。

聚合服务资源，推进社会治理实体化运行。一是平台统揽，创建社会治理三级平台。按照功能完善、互联互通、因地制宜的原则，建立区、镇、村三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平台，赋予各级平台指挥调度、分流指派、督查督办、考核奖惩等权力，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群众工作体系。目前，兰山区区镇村三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平台已全部建设完成，实现了社会治理综合服务全覆盖。二是职能统筹，让三级平台成为社会治理联动平台。坚持党建引领，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整合各类资源，调动政府各职能部门力量，提供开放式、常驻式、窗口式便民服务。在区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创建红色沂蒙、和谐融荣党建品牌，建立接待受理区、诉求办理区、综合保障区、综合协调指挥室，设立常驻窗口、随驻窗口和综合窗口，兜底解决群众各类诉求。三是多方统建，让三级平台成为社会治理共治平台。引入沂蒙义工、孤贫儿童志愿服务团等志愿服务组织，设立志愿服务岗位，提供接待引导、登记填表等服务。引入红领律师、红领法律服务，统筹调配全区党员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轮流到中心值班，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律引导等服务。四是一网统管，让三级平台成为社会治理网上平台。树立互联网+社会治理理念，推动社会治理服务全要素与信息化建设深度融合、互

为支撑。依托“雪亮工程”信息系统，整合党建信息平台、智慧民调信息系统，与“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接，建立集信息采集、纠纷受理、数据集成、智能研判于一体的社会治理智慧系统，实现区镇村三级指挥平台实时对接，形成网上收集研判、线上分类处理、线下督查整改的工作机制，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大增量。

聚力效能提升，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发展。一是打造完善全科网格。按照全域覆盖、规模适度、因地制宜、便于服务、统一编码的原则，整合党建、综治、安全生产、文明创

因地制宜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 陈棋楠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三个同步”助推村集体经济起步。一是组织领导与责任落实“同步抓”，构建上下联动的发展格局。成立村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县领导联系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制度，统筹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出台村集体经济考核激励办法，将发展村集体经济纳入目标考核，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责任体系。二是基层组织与农村队伍“同步管”，汇聚多方协同的发展合力。设立产业党组织，构建起以党组织为核心，龙头公司、专合社等为支撑的“一核多元”集体经济发展体系。在全覆盖选派第一书记的基础上，遴选机关干部、事业人员、优秀返乡农民工到集体经济任务重的村担任支书。三是县级统筹与村级创新“同步推”，探索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实施“三个一”工程，依托重点产业，在每个贫困村建设一个产业园；引进生猪项目，在每个贫困村建设一个养殖单元；采取就近就地建设、飞地建设等方式，在每个贫困村

建设一个扶贫车间。同时，乡镇党委和村级党组织结合实际探索出“合作经营型”“资源开发型”“利益共享型”等发展模式。

“四个加强”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一是加强规划引领。按照“一县一总规、一乡一规划、一村一计划”的思路，编制村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同时，探索“分片试点、示范推进”模式，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近的原则选取“产业示范带”“项目示范点”，集中力量予以重点扶持，让一部分村先发展起来。二是加强队伍建设。结合村支书60岁到龄更换和“一肩挑”配强领头雁；创办“集体经济论坛”，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加强农村经营人才、电商人才、技术人才培养；试点“集体经济公司聘用制”，聘用各类优秀人才担任“经理”，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三是加强政策集成。逐渐转变扶贫资金投向，由过去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转向以村级产业为重点发展。四是加强利益链接。构建“村集体公司+新型经营主体+村民”利益共同体，支持村集体以控股或参股形式与新型经营主体合作，确保村集体和村民利益均沾、普遍受益。

（作者系四川省合江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上接3版）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与外资企业是如何打交道的？如何协助他们落户福州，又是如何坚守原则的？

王文贵：在近平同志任职的几年当中，福州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20%，引进的很多项目都是他亲自谈的，因为我当时分管改革开放工作，所以他谈的这些项目我都参与过。比如东南汽车、冠捷电子、南方铝业等。

上面讲的这几家企业落户在福州，直接能解决万人以上的人口就业，间接带动的就业，估算起来就是几倍的量了。比如东南汽车一来落户，后面陆陆续续建起了70多个配件厂，同时仓库、物流、产业链全都带动起来了。

为了让外商投资更加顺畅，近平同志每个月都要召开外商台商现场会。并且，他把每一个项目都分配到一个副市长或一个常委来负责，责任到人。比如分给我的是冠捷电

子，企业有什么事情都会来找我，我们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到会上进行讨论。

近平同志对外商很讲原则，他经常说，能给你办的，一定给你办，谁不给你办都不行；不能做的，一定不能做，说破天也没有用（说破天：北京话，说到天上去）。比如税收问题，已经在政策上有优惠了，但是不能低于国家规定的幅度；有的项目可以免3年的税收，有的项目规定是5年，但超过额度就不行了，否则，福州也贴不起。地价可以给外商便宜一些，但是也不能低于国家的规定，况且福州市还要付给老百姓征地补偿。

还有很多问题，近平同志都坚守底线。在环保问题上，他从来不让步，比如我们有一家外资企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苯，这种东西会影响人体健康，近平同志就要求这家企业必须达到环保标准，对工人也要做好防护，对他们的健康

不能产生任何危害，如果做不到就得停产。再有，工人的工资都要有保障，严格监督执行，不能低于一定的标准。还有，外商里面有很多华侨，他们会提出一些干部提拔的意见，甚至试图影响人事问题，近平同志对此是绝对不允许的。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既是老同事，又是好朋友。请讲讲您和他之间交往的一些小故事。

王文贵：近平同志完全没有官架子，绝不高高在上，他既是我们的好领导，又是我们的好同事，和大家的关系一直很融洽。1992年，近平同志还到我老家去过。我的老家在乡下，他到我家很放松，一点也不拘束。

1993年，我到深圳办事，拜访习老。老人家留我吃饭，饭前闲聊，我说：“习老，我看您这么大年纪，身体还这么好！”习老很幽默，也很直爽，他站起来说：“我一辈子没有整过人，没有害过人，当然身体很好了！”老爷子这么幽默，逗得